

从“批判话语分析(CDA)”到“传播民族志”(EoC)

——话语、传播实践与“钟情妄想症”的分析示例

李耘耕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香港 新界沙田)

【摘要】近年来,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都成为传播学关注的焦点。由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和范迪克(Van Dijk)等人推动的批判话语分析(CDA)是连接语言文本与其所在社会文化的语境的分析桥梁。然而从语言和文本本身出发的研究无法将言语行为看作在具体传播情境下社会互动的产物。与批判话语分析不同,“传播民族志”从传播实践出发,将话语放置在特定的“言语共同体”和具体的“传播实践”场景之中加以考察。利用民族志的方法,“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简称EoC)旨在说明不同的言语主体,如何通过调用内在或外在于该“言语共同体”的话语和传播资源建构自己的“传播资质”,从而建构权力秩序。利用“传播民族志”的框架,通过分析在一个特定的互动场景中(晚饭聚餐),研究者与数位精神科护士讨论“何为钟情妄想症”的“传播实践”,说明,在特定情境下,话语的特定意义是不同言语主体言语行为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与批判话语分析相补充,“传播民族志”帮助研究者更好理解话语是如何通过日常的“传播实践”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在一个多重话语并置甚至冲突的情境下,作为“传播资源”的话语,如何对不同“言语主体”施加权力并形塑特定话语的意义。

【关键词】批判话语分析;传播民族志;传播实践;钟情妄想症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6)09-0100-11

一、导言:批判话语分析(CDA)的传统

自福柯(Foucault)以来,话语成为语言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约根森(Jørgensen)和菲利普斯(Phillips)将话语宽泛地定义为“一种谈论和理解世界(或世界的某个方面)的独特方式”^①。在他们看来,话语并非孤立存在的语言现象或是文本,而是一种语言实践。此种实践“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并作用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世界之构成”^②。福柯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是被一套既定的程序所控制、挑选、组织以及分配的。^③话语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然而此种语言活动却不同于日常的对话,话语是一种渗透了权力关系的语言主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完成的言语行为。因此话语不是简单地被编排过的语言行为,它同时是我们所处社会语境言说自己的一种方式。

【收稿日期】2016-05-23

【作者简介】李耘耕(1987—)男,河南郑州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健康传播等方面的研究。

① Jørgensen, Marianne, and Louise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1.

② Jørgensen, Marianne, and Louise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61.

③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媒介与新闻文本,历来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取向。通过研究新闻和媒介话语,范迪克(Van Dijk)和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将话语分析应用至具体的语言文本。范迪克认为话语分析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传统都或从话语分析中汲取营养,或给予话语分析以灵感。范迪克曾特别指出,来源于修辞学的话语分析,在经过结构主义、社会语言学(及脱胎于其中的言说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以及文本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的影响和形塑之下,已经成为融合语言使用和话语认知、社会和文化向度的综合性分析;并且其分析对象也从书写文本扩展至口语、媒介乃至日常对话等不同风格(Genres)的文本。^①因此,范迪克将话语界定为具有“多元层级结构”(Various Level of Structure)的语言实践。^②这一结构可以通过将句法、语义、文体和修辞这些文本特征放入特定的文本类型(如论辩、故事或者演讲)中进行分析,进而理解语言使用者的生产或使用话语时的认知(心理)过程。范迪克不仅将话语理解为一种认知层面的言语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动。作为社会行动的话语往往是更高层次行动或事件的结构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更高层次的社会行动或事件包括一堂课、一次审问、一场新闻发布会抑或一次看病寻医。话语即是在这样的社会事件的场景中被言语主体用来实践一定物质和符号权力的那些语言资源。^③费尔克拉夫指出,范迪克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语言学模型,它从话语的语言结构出发,最终落脚于嵌入在语言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之中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s),即对文本本身的话语分析就包含了对生产出这些文本本身的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的指认。^④

与范迪克相似的是,费尔克拉夫同样重视话语的实践向度。但与此同时,相比于范迪克的社会语言学模型,费尔克拉夫更加关注话语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位置与作用。在他看来,话语实践既是构成性,同时也是生成性的。话语实践是镶嵌在其所被生产出的社会文化实践之中,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媒介、政府、医院等)在一定的知识、权力、社会关系以及身份认同的框架不断地生产各种话语;另一方面,话语实践又构成了广义的社会文化实践的一部分。知识、权力、社会关系以及身份认同在话语中被再生产出来。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语言结构,还通过语言文本的生产与消费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再现并巩固。^⑤

因此与范迪克不同,费尔克拉夫并不执着于中和话语中的批判因素。相反,于他来说,话语分析天生就是批判的。在此基础上,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批判话语分析(CDA)的三向度模型(见图1)。^⑥费尔克拉夫利用三向度模型分析在“传播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中的话语实践。他将话语实践看作“在文本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中介”^⑦。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存在指认了社会文化与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的间接性,即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的特征形塑文本,但却是通过形塑文本被生产以及消费的方式所实现,这些方式构成了文本本身的语言学特征(如风格、语序、结构以及遣词造句等),而话语分析的任务就是通过解读文本的语言学特征进而深入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实践之中,揭示话语如何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形塑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以及

① van Dijk, Teun A.,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88, pp. 1-2.

② van Dijk, T. A., "Discourses as Interaction in Society", In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edited by T. A. van Dijk, 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p. 2.

③ van Dijk, T. A., "Discourses as Interaction in Society", In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edited by T. A. van Dijk, 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p. 14.

④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p. 28-30.

⑤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p. 53-66.

⑥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 59;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p. 73.

⑦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 60.

权力结构。^① 话语实践镶嵌于社会文化实践之中,被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实践所形塑的同时也在形塑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实践本身。费尔克拉夫所提出的批判话语分析将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放置于社会文化实践的核心地位,话语折射出的是权力关系运作的机制,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语言要素(Linguistic Device)发挥作用。^②

然而“批判话语分析”在处理语言和言语行为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首先,由于将语言和文本本身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话语分析不能将语言和言语行为看作社会互动的产物。换句话说,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三向度模型中,“文本”是被动地编织在社会文化与话语实践之中的,而不是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不同言语主体依据言语行为所发生的即时情境而互动出来的产物。也就是说,在以“文本”为中心的话语分析中,言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是缺失的。存在的不过是个模糊的“文本生产者”以及漂浮于文本之上的抽象的“权力主体”。

另外,范迪克也好,费尔克拉夫也罢,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建构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上,围绕话语实践的主题,给出了诸多深刻而又精准的概念化工具。然而相比于他们对话语概念的关注,“话语分析”对于社会文化实践的定义相对模糊并缺乏操作性的分析工具。但是社会文化实践又是将“话语分析”与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相勾连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遗憾地发现,在诸多话语分析的经验研究中,从“文本”出发的批判常常跳跃式地落脚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却无法有效地回应生产并维系此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机制是怎样运作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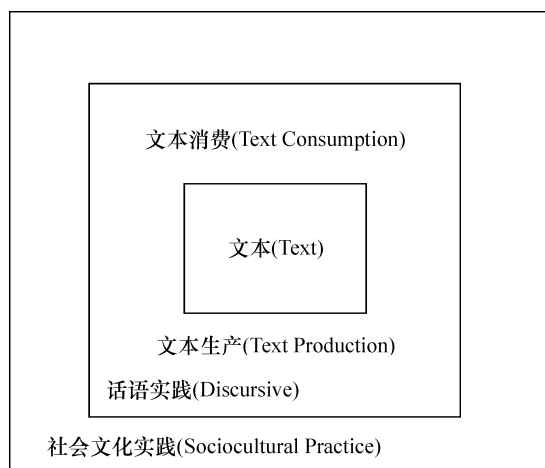


图1 Fairclough 的批判话语分析(CDA)的三向度模型(见 Fairclough, 1995: 59)

二、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在“言语共同体”中安置“话语”

戴尔·海默思(Dell Hymes)提出并由格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多纳·卡布(Donal Carbaugh)等学者推动的“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简称EoC),又称“言说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为弥补“批判话语分析”的不足提供了新的视角。^③“传播民族志”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海默思于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这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海默思提出了一个以“民族志为基础,以传播为视角,并将传播所带来的各种形式化的复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

①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p. 60-61.

② Fairclough, Norma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③ 国内有学者将“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译为“民族志传播学”,将“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译为“交谈民族志”。根据英文译文习惯和此种理论的理论内涵,本文笔者倾向于将两者分别译为“传播民族志”及“言说民族志”。

论。海默思看来,这样的方法论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它不是简单地将源自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分散数据拿来分析,而是将语言看作一种镶嵌于其所在社会文化语境,并与其不可分割的社会和传播实践,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数据获取手段,即民族志;其二,“传播民族志”与“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不同,它不将语言本身的结构、语法甚至言语行为本身当作研究的参考系,而是将语言和言语行为本身看作一个“言语共同体”的语境,进而研究这一共同体中成员共同分享的传播习性。最终,语言和言语行为被看作是“共同体”中不同成员依据自身所处的社会互动环境所进行的实践。在此视角下,“话语”不再是被动的“文本”,而是各个“言语主体”所主动参与调用的“传播资源”。^①

在传播民族志中,“传播”或“言说”都代指一种特定语言使用方式,菲利普森将此概念化为“言说方式”(Means of Speaking)。广义地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中,人们都有一套相互交往与沟通的语言方式,包括“媒体和传播方式、本地语言及其各种变种、方言、言说风格、传播习惯、组织惯例、手势系统以及和传播相关的信仰等等”^②。在此意义上,该社群形成了一个“言说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共享言说方式和言说阐释规则,共享对至少一种语言变体的阐释规则”^③。“言语共同体”是“传播民族志”的核心概念。此概念并非“传播民族志”独有,而是一个在许多“社会语言学”分支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中,“共同体”向来是一个“大概念”。它将人们的行动描述为在一个大的“共同体”认同之中的反映,这个共同体往往是先在于个体及其行动,抑或由于群体的想象与认同而对个体具有结构性的强制力。比如现代民族国家就被安德森描述为一个边界广阔而且对个体具有结构性强制力的“想象的共同体”。^④但是,“言语共同体”却颇为不同。“共同体”不仅仅是外在于个体和社会互动之外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各个主体之间借由语言完成的“此时此地”的互动定义并形塑的新而小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传播和言语行为保证了人、语言、文本以及各种传播内容的流动与传递。^⑤一个“共同体”内,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共享了传播和语言的规则。但这样的共享并不会限制传播和互动行为的结构。相反,各个“言语主体”在“此时此地”的传播和言语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言语共同体”的“传播密码”贡献了新的内容。而且,由于互动语境的无限可能,主体的能动性以及传播和言语行为的丰富多元性也就自然不过。在此意义上,“言语共同体”就是一个由多元主体组成,借由各种传播和言语行为实现的“传播共同体”。

话语实践在“言说共同体”中扮演重要角色。海默思将话语看作一种“语法和范式意义上的言说行为”^⑥。话语标识了言说行为中各组成部分的序列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言说行为的社会文化属性。因此,“话语”既是言说共同体的一种共享的言说方式,又为特定的言说方式设定规则。“传播民族志”精髓在于将传播行为放置在一定的话语情境中考察,所以有学者提出,“言语共同体”事实

① Hymes, Dell, "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6, No. 6, 1964, pp. 1-34; 另参见 Hymes, Dell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J. Gumperz and D. Hyme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2, pp. 38-71; Hymes, Dell,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Abingdon, Ox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7.

② Phillipsen, Gerry, and Lisa Coutu,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In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edited by Kristine L. Fitch and Robert E. Sander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5, pp. 355-380.

③ Hymes, Dell,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J. Gumperz and D. Hyme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2, p. 54.

④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⑤ Ben Rampton, "Speech Community and beyond", In *Sociolinguistics*, edited by Nikolas Coupland and Adam Jaworski,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99-316.

⑥ Hymes, Dell,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J. Gumperz and D. Hyme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2, p. 54.

上也可以理解为“话语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①

在海默思和菲利普森的启发下,卡布提出了“文化话语分析”(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来研究“言语共同体”的“话语实践”。文化话语分析建基于两个假设之上:①语言是社会文化性构成,②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反过来也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②由此,文化话语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传播是如何被形塑为一种文化实践的。”^③不同于批判话语分析,文化话语分析不从既定文本出发,而将日常传播行为中的语言运用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对人们如何通过传播和语言生产意义并建构社会生活进行阐释。因此,正如卡布所言,文化话语分析致力于回答三个具体的传播问题:

1. 当人们以这种方式交流时实现了什么(功能)?

2. 传播实践是如何被组织在一起的?有哪些文化养料、因素和特征参与其中?

3. 什么样的言语和行为序列构成了这种传播实践?或者反过来,此种传播实践处在更大的社会事件序列中的什么位置。^④

三、“传播民族志”的分析框架:以“传播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言语共同体”的概念是为了超越纯粹从语言文本出发的分析,将人与人之间、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有机互动当作言语行为的根本。所以,有学者提出,“言语共同体”不是语言共同体,而毋宁说是“实践的共同体”。^⑤此处,“实践”指涉的不仅是在一个共同体内人们的语言和传播行为,更重要的是指向语言的和传播行为背后的身份认同、社会分配以及文化建构等问题。尽管海默思本人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实践”的概念。他却提出了利用“传播民族志”视角进行研究的分析单元(Units of Analysis),分别是情境(Situation)、事件(Event)以及行动(Act)。情境是指传播行为发生的语境;单一的传播事件是指有共同传播目的、话题、相同参与者遵循相似的话语和传播规则参与的一组传播行为;传播事件“终止于主要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或者焦点的改变”^⑥;最后,传播行动是指具有单一交往功能的行为,比如一个请求、命令等,既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⑦将这三个分析单元整合在“言语共同体”的概念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海默思一样是由“实践”的逻辑介入“传播民族志”分析的。因此,我将使用“传播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来总括这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分析单元,“传播实践”是指在特定的传播情境(Situation)中,不同的言语主体(Speaking Subjects)各自的传播行动(Act)相互纠缠、互动,从而构成了一系列的传播事件(Event)。与费尔克拉夫所提出的传播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概念相似的是,对传播实践的考

① 参见 Saville-Troike, M.,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3r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Ben Rampton, “Speech Community and beyond”, In *Sociolinguistics*, edited by Nikolas Coupland and Adam Jaworski,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99 – 316.

② Carbaugh, D.,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6, No. 3, 2007, pp. 167 – 182.

③ Carbaugh, D.,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6, No. 3, 2007, p. 168.

④ Carbaugh, D.,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6, No. 3, 2007, pp. 169 – 170.

⑤ Ben Rampton, “Speech Community and beyond”, In *Sociolinguistics*, edited by Nikolas Coupland and Adam Jaworski,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304.

⑥ Saville-Troike, M.,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3r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 23.

⑦ 参见 Saville-Troike, M.,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3r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 23 – 26.

察需要在超越语言使用本身,而将言语行为(话语或传播行动)放置在更大的社会文化实践的背景之中。^①然而与费尔克拉夫不同的是,“传播实践”更关注“此时此地”的传播问题,以及这样的传播问题是如何即时性地嵌入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当中,并反过来影响传播主体的身份认同以及意义阐释行为的。换句话说,传播实践是将“批判话语分析”转化为“文化话语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隐身于话语背后的主体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并置于“传播实践”的分析之下。这样,在一个特定的“言语共同体”中,以各个不同的“言语主体”(Speaking Subjects)所参与的“传播实践”出发,“传播民族志”的研究落脚于分析不同来源与性质的话语是以何种方式参与进“传播实践”之中,并反映甚或影响参与者的主体性,建构话语意义,最终形塑“言语共同体”的意义规范。正如兰普顿(Rampton)所言,“实践”的共同体理论关注传播和互动主体的身份是如何在一个共享的互动环境中建构的。而这样的身份建构是基于这一环境中机会以及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实现的。^②

在一个特定的“言语共同体”内,不同的“言语主体”的不平等体现在其“传播资质”的差别之中。^③“传播资质”的提出是海默思对乔姆斯基(Chomsky)“语言资质”(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回应,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资质”是指对于语言结构(语法)的不言自明的知识,每种语言的用户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此种知识进行日常交流。海默思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资质”忽视了语言行为本身的社会文化性。所以海默思提出的“传播资质”不仅仅“包含知道语言密码,还包括明白对谁说什么,以及在特定情境中怎样说才是合适的。更进一步,它包含言语主体理应具有的社会和文化知识,这些知识能够使他们使用和阐释各种语言形式”^④。因此,“传播资质”包含“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交往技能”(Interaction Skills)、“文化知识”(Cultural Knowledge)三个基本类型的“资质”。“传播资质”的概念指向了在“传播实践”中各个“言语主体”之间借由言语行为折射出的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性。然而海默思以及“传播民族志”却没有解释这种不平等的来源及其与其他社会文化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兰普顿曾经指出,“言语共同体”中的共同体应当是复数的。^⑤也就是说,“传播民族志”虽然从某一特定共同体出发,但却不会将自己封闭在这一特定的共同体之中。相反,来自于不同“共同体”的话语是如何实现跨语境的传播并且在某一特定“共同体”中实现融合,最终通过“传播实践”将社会不平等关系编织进特定的“共同体”之中是“传播民族志”最终需要回答的问题。经过这样的概念整合,“传播民族志”甚至有能力将社会文化批判的维度纳入其理论设计之中。由此“批判话语分析”非但不与之矛盾,还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融合,相得益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传播民族志”已经提供的概念框架缺乏可资利用的解决方案。“传播资质”仅仅指向言语主体在“传播实践”中作为结果呈现的传播能力的差别,却不涉及构成或导致“传播资质”不平等的社会来源。在这一点上,“传播民族志”的确顽固秉持了某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但对“言语共同体”中更深层次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处理起来却捉襟见肘。为了解决这样的尴尬,我将引入“传播资源”(Communicative Resources)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脱胎于批判的话语分析传统,并且海默思在其晚期对教育领域“传播实践”的分析中,也越来越重视“语言—传播

①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 68.

② Ben Rampton, “Speech Community and beyond”, In *Sociolinguistics*, edited by Nikolas Coupland and Adam Jaworski,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304.

③ Hymes, D., “On Competence”,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58–81.

④ Saville-Troike, M.,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3r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 18.

⑤ Ben Rampton, “Speech Community and beyond”, In *Sociolinguistics*, edited by Nikolas Coupland and Adam Jaworski,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04–305.

资源”(Linguistic-Communicative Resources)分配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① 布洛玛特(Bloomaert)将“传播资源”定义为“语言手段与传播技能的综合。言语主体能否使用语言的各种变体,他们能否读写以及调动特殊的资源以实现他们在社会中的特定行动”^②。布洛玛特对“传播资源”的界定相较于海默思的“传播资质”,差别不大。所以在本研究中,为了区别这两者,我将“传播资源”界定为内在或外在于“言语共同体”,可供“言语主体”借鉴并调用,从而影响他们差异的“传播资质”的各种话语资源。因此,“传播资源”不局限在“言语共同体”内,而包含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各种“话语汇编”(Discursive Corpus),“传播资源”将发生在特定“言语共同体”中的“传播实践”与多种社会文化实践桥接起来。诸如“什么样的传播资源”、“谁有权力调用”以及“如何分配”这样的问题将直接面向一个具有社会批判性的问题“谁有权力使用(某种)话语和传播方式,而权力又是如何通过传播实践生产并维系自身的”。至此,本文章提出了“传播民族志”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框架(见图2)。最后,利用此概念框架,我将引入一个具体的研究案例,这一案例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志研究,但管中窥豹,希望这样一个略显碎片化的分析能够为“传播民族志”的研究和理论建构打开思路,成为通向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建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传播理论之路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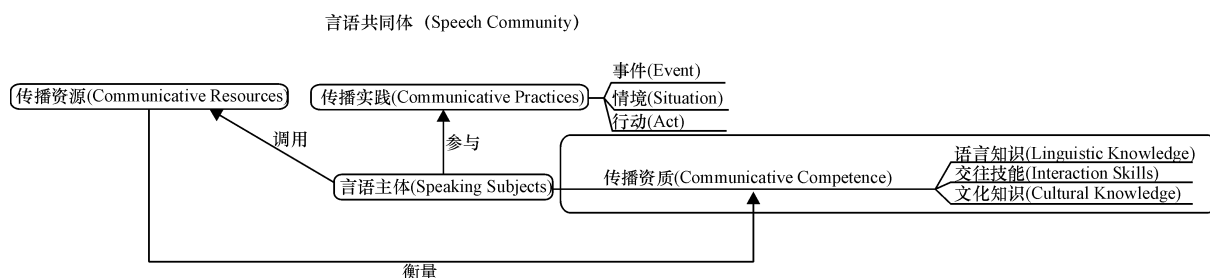


图2 “传播民族志”概念关系示意图(笔者根据理论推导绘制)

四、“钟情妄想症”:一个传播民族志的分析示例

以下分析的研究案例来源于我一项研究的前期田野工作。我利用“传播民族志”的方法分析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精神病院(广州惠爱医院)中的传播实践,尤其是医生与精神病患、护士与精神病患、病患之间以及医护人员之间发生的种种传播与互动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各种关于精神病的话语相互角力,最终动态地建构各个主体对于“疯狂”内涵的理解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如何在“此时此地”的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中国的精神医学始于19世纪末期,我所研究的广州市精神病院(又称广州惠爱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也是中国现代精神医学的滥觞之地。其前身是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于1898年始建的“惠爱医癲院”。现如今,广州惠爱医院是广州市规模最大的精神专科医院,也是广州市仅有的两家公立精神病院之一(另一家是广州民政局精神病院)。^③ “钟情妄想症”的“传播民族志”分析示例来源于我前期的田野实践。在正式进入医院展开田野调查之前,我和惠爱医院护理部的护士结识并成为朋友。2015年3月,我再次到广州和几位护士朋友聚会。其中护士Z邀请我和他的另外三位同事(护士L、护士W以及护士H)以及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也是惠爱医院的护士)前往Z护士家一起吃晚饭。席间,我们谈兴甚浓,交流诸多发生精神病院内的奇闻趣事。关于“钟情妄想症”的讨论也就

① Hymes, Dell., *Ethnography, Linguistics, Narrative Inequali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Voic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Ltd., 1996.

② Blommaert, J., Context Is/as Critiqu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 21, No. 1, 2001, p. 21.

③ 广州惠爱医院现有的芳村住院部沿用了19世纪“惠爱医癲院”的旧址。现存医院最早的建筑“惠爱楼”也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于此。由于饭桌的谈话皆为非正式闲谈,并没有录音等精确文本,因此以下对话是根据我的田野笔记整理而来的。^①如前所述,本次对话发生在我(研究者)和广州惠爱医院的护士之间,他们是精神病院核心的日常实践主体。我们的对话是通过他们日常工作的经验来交流“疯狂”的意义和内涵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对话情境下,护士们的谈话可以看作是隶属于广州惠爱医院这个“言语共同体”内的言语行为。而研究者作为一个外在于这个“言语共同体”的言语主体,“我”和他们的对话将我引入这样的一个“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s)当中。

情境:五位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护士和研究者在护士Z家的家庭聚餐

事件:参与者在交流关于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种种经历和感想,参与者非轮流地对话与交谈

行动:一段发生在研究者和护士L之间的对话。对话开始于研究者提问如何判定一个精神病人是否存在幻觉(妄想),因为现实中的人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想象,为什么“疯子”的妄想就需要“医治”,而普通人的“白日梦”就不需要。护士L年龄和研究者相仿,但已经是在医院工作了8年的“老护士”。他给研究者举了“钟情妄想症”的例子。

护士L说有一种妄想叫作“钟情妄想”又叫“关系妄想”。就是老是认为一个明明不喜欢你的人喜欢你。

我接着说,那这不就是单相思或者自作多情吗?正常人也会有,怎么能判断是妄想呢。

护士L说,那不一样,“钟情妄想”是事实上对方的确不喜欢你,你还坚信对方喜欢你。

我不服气,“自作多情”不都这样。

护士L举例,例如有个病人总是认为范冰冰喜欢自己,还说范冰冰已经嫁给了自己,这不是妄想是什么。

我不作声,默认这种说法,结束这段对话。

借用“传播志”的视角会发现,我们概念模型中所出现的各个概念要素基本完整地呈现在这一段简单的对话中。首先,这是个关于“疯狂”意义讨论的传播实践。这一传播实践由三重要素构成。朋友聚餐的情境限定了这样的讨论是一个“非正式”场合的闲谈。在此情境下,关于“什么是钟情妄想”的话题成了一个传播事件。家庭是其发生的空间,而时间则是晚饭时分。传播事件同时定义了传播方式,在话语分析中,这有被称作传播的“形式”(Genres)。作为言语主体的我与护工L的对话是这一传播实践中对话的主题,所以我们也是“传播实践”的行动主体,我们在对话中做出了对“钟情妄想”的不同诠释。

虽然田野记录的对话不适合进行严格的对话分析,但是经过研究者对对话意义以及语境的还原,我们还是可以有限度地利用对话分析的逻辑并综合传播实践的概念分析这段对话。在此对话中,研究者作为“精神医学”的门外汉是第一次听说“钟情妄想症”的概念。护工L提出这一话题时,在一个有限的对话轮转体系内,^②护士L与研究者在对话开始便出现了“传播资质”的差异。研究者和护士L在此语境中,由于二者用同样的语言交流,并且语言本身不构成对诠释“钟情妄想症”的显著影响。在语言知识层面没有差别,而交往技能在诠释“钟情妄想症”的意义上也没有显

① 来源于田野笔记的对话意味着对话仅保留大致原意,不准确对应真实发生过的谈话,因此此分析不可被看作是“对话分析”,而仅仅可以看作是依赖于研究者参与式观察的再现式数据。“对话分析”可以是“传播民族志”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田野实践无法保证对话都能被精确捕捉。而观察记录的数据也可以作为“传播民族志”的数据来源,综合利用对话、田野笔记以及已有文本的数据分析成为“传播民族志”最重要的一个方法,这也是“文化话语分析”(CuDA)不同于“批判话语分析”(CDA)以及“对话分析”(CA)的区别所在。

② 对话轮转(Turn-taking in conversation)的概念来自于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Sacks(1974)等人指出在日常对话中频繁出现的对话轮转及其规则。一个对话轮转是指对话双方共同默认的对话组,通常成对出现,由多个会话轮转组成的意义完整的对话就是对话轮转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规则,如无间隙、无重叠以及纠偏机制等。参见Sacks, H., Schegloff, E. A. & Jefferson, G.,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Vol. 50, No. 4, 1974, pp. 696 - 735.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著影响, 尽管二者的交往技能可能存在差别, 但在此语境下, 也可以视为无差别或差别与此“传播实践”无关。最后, 两个言语主体涉及具体话题的“文化知识”出现了明显的差别。

护士 L 在对话开始之前就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医学专业知识, 他熟知存在“钟情妄想症”这一精神障碍亚型, 而研究者不知。在第一对对话轮转中, 护士 L 给出了“钟情妄想”的定义。这一定义与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纂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 中对钟情妄想的核心主题是“另一个人钟爱自己”并伴离奇内容的定义相似。^① 通过调用精神医学专业的言语资源, 护士 L 的言语行动(Act) 将此段对话定义为对“钟情妄想症”意义的探讨。显然, 护士 L 对“钟情妄想症”的阐释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第一段对话轮转中, 我提出了对“钟情妄想”所指涉的病症的质疑。作为一个参与在对话中的言语主体, “我”(以下我都特指研究者) 不具备精神专业话语资源。在第一轮的质疑中, 我所调用的话语资源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换句话说, 这一经验构成了我在这一对话(传播实践) 中的传播资源。对“单相思”和“自作多情”的强调源于非精神医学专业人士对“钟情妄想”这一专业话语的反应。此反应是要求另一对话者对其话语进一步的解释的起点。护士 L 的第二步解释依然依赖于专业的话语资源, 强调“钟情妄想”的离奇特征符合精神医学话语对“妄想”“难以置信的、不可理解的, 也不是来自于平常的生活经验”的解释。^② 在第二轮的话语轮转中, 护士 L 的回答为“钟情妄想”的定义限制了条件。接下来, 当研究者仍然未能被此“专业话语”所说服时, 护士 L 引用例证的方式来进一步论证“钟情妄想”的合法性。在此对话的最后一个对话轮转中, 护士 L 的例证来源于日常的生活经验。这里出现了“传播资源”与“传播资质”的重要转换, 在之前的对话中, 研究者所调用的“日常话语资源”与护士 L 所调用的“精神医学话语”形成了“话语冲突”。在家庭聚餐的情境中, 两种话语资源并不直接导致言语主体“传播资质”的“高下之分”。在最后一对对话轮转中, 护士 L 的“例证”不仅仅是调用了精神医学的话语, 还同时利用日常生活的经验话语来给予“钟情妄想”以合法性说明。在此情境中, 由于护士 L 同时可以调用两种不同的传播资源来论证“钟情妄想症”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在此段对话中所呈现的“传播资质”发生了区别, 最终, 护士 L 的例证结束了此段对话, 从而完成了其对“钟情妄想”的话语权力之建构。

护士 L 在这一分析案例中的话语复制了“精神医学专业话语”对一种“病症”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可以被简单形式化为“定义—条件—例证”的结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其一, 在一个非“医疗诊断”和“非正式”的谈话情境中, 这种话语结构的对应并非有意为之, 而可以理解为在特定情境中, 专业话语给从业者带来的“内化”效应; 其二, 护士 L 并非专业的精神科医生, 他对精神专业话语的掌握更多地来源于其日常的工作经验。因此, 此段对话在前半部分所呈现的“日常话语资源”与“医学专业话语”的对等冲突仅仅在此情境中, 发生在这样的言语主体之间才有意义。如果传播情境转换为医院的诊疗空间, 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以上的分析案例提供的仅仅是发生在研究者和精神病护士之间的一个简单对话。但即便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传播实践”的情境中, 实践都展现出了其复杂的多元性以及多层次的面向。利用“传播民族志”的分析框架, 这样的分析还可以继续下去, 从而探讨在何种条件下, “精神医学话语”抑或其他“话语”可以“赋权”对“疯狂”的意义阐释, 从而反推为此种话语赋权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内在运作机制。基于本文要旨所在, 进一步的分析将留待更深入的民族志来完成。

①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著, 张道龙等译《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7—38 页。

②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著, 张道龙等译《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7—38 页。

五、结论与讨论：“传播民族志”的应用及其局限性

以上的理论回顾、阐释与研究案例的分析试图说明,“传播民族志”不仅仅是一种研究传播行为和事件的方法,同时还是一种重新审视传播本质以及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实践中,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易被文本化或规范化的传播实践中权力关系是如何在各言语(传播)主体之间分配与流转的。在本篇文章中建构或论证的一组“传播民族志”中相互关联的概念(言语共同体、传播实践、传播资源、言语主体以及传播资质)都是动态的概念,只有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才能看到其意义和权力在其中各个环节的流转与转换。我所提出的“传播民族志”的分析框架更贴近福柯所说的“权力之网”。在这个身处于“权力之网”中的传播实践才构成了“真理的政权”,重要的不是真理如何建构的,而是各个主体如何在动态的“传播实践”中不断协商、争夺抑或分配“真理的话语”。^①然而权力并不是直接在“传播实践”中为自己代言的。毫无疑问,任何“此时此地”的“传播实践”都渗透着权力的分配与流转,然而与“批判话语分析”不同,“传播民族志”不会直接从“话语”中看出“权力”。毋宁说,“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在“传播实践”中被定义和实践的“话语”。所以“传播民族志”的“权力观”建立于对传播实践的情境以及参与主体的身份反思之中,也建立在不同的传播资源和传播资质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传播实践”呈现的。

“传播民族志”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前景极其广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对于“传播”以及“话语”概念的扩展。“传播”的概念在“传播民族志”的视野中不仅仅是简单的人际传播行为,尽管人际传播可能是“传播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但“传播民族志”中的传播问题同时也指“我们借由传播实践去重新建构的关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的经验之意义”。^②我们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话语之方式,以及我们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与自身、他人甚至环境之间的传播与意义交换都是“传播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因此,在“传播民族志”的框架中,“话语”的概念也被扩展,话语成为人们生活于“此时此地”的意义中介物。因此,不同于批判话语分析中的“话语”,在“传播民族志”及“文化话语分析”之中,话语即文化。而话语也不再对应冷冰冰的文本或是潜藏于文本之下的“社会文化结构”之映像,而变成了具有自我反思性的动态“传播实践”的一部分。传播者实践的参与者也好,作为参与者一员的研究者也好,都在使用一定的话语资源来建构或维系自身在传播实践中的主体性。因此,处在“传播实践”中的“话语”总是具有自反性的话语。卡布等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话语自反性”的三个维度:(1)话语的“自反性瞬间”为即时性的“传播实践”赋予意义;(2)话语的“自反性”源于它将传播实践引向某个原则化的立场;(3)话语利用自反性瞬间和自反性来源实现特定的民族志目标。^③简单来说,这三个原则就是“自反性瞬间”、“自反性导向”以及“民族志目标”。话语的自反性决定了“传播民族志”与“批判话语分析”的一个根本性不同,那就是“传播民族志”不会把任何处在“传播实践”中的行为或“话语”视作理所当然或是“事先编排”的。话语作为“意义建构的实践”并不总是简单地反映某种社会文化、权力抑或意识形态结构。相反,“话语”的使用甚至可能潜在地改变某种既定的社会文化、权力抑或意识形态结构。在“钟情妄想症”的分析案例中,研究者和“护士”都不是某种话语的代言人,而精神医学的话语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

① Foucault, M.,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D. Wood & J. Medina eds., *Truth: Engagements Acros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4, pp. 315 - 335;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② Carbaugh, D., Nuciforo, E. V., Molina-Markham, E., & van Over, B., “Discursive Reflexivity in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Vol. 11, No. 2, 2011, p. 154.

③ Carbaugh, D., Nuciforo, E. V., Molina-Markham, E., & van Over, B., “Discursive Reflexivity in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Vol. 11, No. 2, 2011, pp. 153 - 154.

合法化“精神病”的意识形态。而可能恰恰相反,在一个日常生活的情境中,精神医学的话语由于与“非专业”的日常经验话语相遇,反而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完整性和意义。

事实上,“传播民族志”的应用也并不仅仅局限在人际传播或是大众传播的框架内。米尔斯特恩(Milstein)等人的研究探讨了新墨西哥州西班牙裔“在地关系”(Relations-in-Place)的观念。通过对新墨西哥州西班牙裔各种话语资料(如文学、故事、访谈等)的分析,这一秉承了“传播民族志”精髓的研究描绘了这一少数族群是如何通过各种话语和传播行为建立并维系不同于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和文化观念的。^①而卡布等人的研究甚至直接将目光转向了“人机互动”的前沿领域。将智能化的汽车视作一个特殊的传播情境,卡布等人的研究试图通过“传播民族志”和“文化话语分析”的方式回答诸如如何通过优化沟通体验来促使汽车驾驶员使用智能的操作系统。^②虽然用“传播民族志”进行这样实践导向研究的效果还有待探索,但至少说明,在理解各种传播情境中,人如何阐释并建构自身和所在情境以及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传播民族志”有着独一无二的理论和方法优势。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大一统”的完美理论或对人类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案,“传播民族志”也不例外。如何从微观的“传播行为”过渡到对宏观传播与社会机制的分析,这一问题“传播民族志”的现有理论和方法设计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尽管“传播民族志”在处理以文化和话语为中心的传播实践上有独特的优势,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传播民族志”还是难以直接透过“传播实践”达致对社会结构的变迁之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结构之变迁很少会直接烙印在每个个体的每次行为之中,其次也是由于分析社会结构变迁所要求的结构性数据与历史实证的资料是无法通过“民族志”的方法获取的。“传播资源—传播资质”的概念体是一个可以将个体的传播行为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传播机制勾连的概念。“言语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任何“传播实践”发生的场域都与其他传播场域发生着联系。但是分析不同身份的言语主体可以调用的传播资源、“传播资质”的差异以及不同“言语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分析。例如,和言语主体相关的言语共同体的历史、结构以及言语主体在此历史结构中的位置、由这一历史结构所导致的不同言语主体之间“传播资质”以及可调用的“传播资源”之间的差异都需要超越话语分析和传播实践的分析。而此类分析,在目前的“传播民族志”框架下,尚属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因此,日后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当以此为契机,为使“传播民族志”能够成为培育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在地”传播理论的温床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 王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① Milstein, T., Anguiano, C., Sandoval, J., Chen, Y.-W., & Dickinson, E., “Communicating a ‘New’ Environmental Vernacular: A Sense of Relations-in-Plac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 78, No. 4, 2011, pp. 486–510.

② Carbaugh, D., Winter, U., van Over, B., Molina-Markham, E., & Lie, S., “Cultural Analyses of In-car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41, No. 2, 2013, pp. 195–201.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ovels of Exposure” (Qianze Xiaoshuo) defined by Lu Xun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novels of social sati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ncept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But we haven’t studied the process of the concept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at the concept is based on. After probing into this question , we will make clear the criterion ,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Novels of Exposure” , then we will maintain that we need to make an academic breakthrough.

Key words: Novels of Exposure; the novels of social satire; Lu Xun; genre

The Tree would like to be Quiet but the Wind is Blowing

—Study on the Incident of *Letter Answer Trotskyite* Written by Lu Xun

PENG Guan-long

*College of Literal Arts ,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and emotion in the year of 1936 , a new statement about the incident which a letter answer Trotskyite written by Lu Xun can be pointed , Lu Xun may be reluctant to write back. According to this view , many details can be reinterpreted , and also shed light on understanding Lu Xun during his last period of life.

Key words: a letter answer Trotskyite; Lu Xun; Trotskyite

Trust Capital and Sentimental Rhetoric of Public Welfare Mobilization Documentary:

A Case of *the Kony 2012* and *Under the Dome*

DENG Xiu-ju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uhan 430074 , China

Abstract: Social media are broadening their cover range and influence depth with the way of stripe across the border and community , and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s advancing to the direction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trans-platform. Whe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gets into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social media with time goes by , the social capital access and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sponsor , middleman and receptor is key factor in the mobilization. As a main form and element of social capital , the trust capital act the function to attract , persuade and promote i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started by the social media user.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Kony 2012* and *Under the Dome* with three dimension of subjective identity , mobilization action and family roles , to reveal the position ,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trust capital in the social media mobilization.

Key words: public welfare mobilization documentary; trust capital; social media; *the Kony 2012*; *Under the Dome*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o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oC) : Discourse , Communicative Practice and a Case Analysis of “ Erotomaniac Type of Delusion Disorder ”

LI Yun-g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atin , N. T. , Hong Kong

Abstract: Recently ,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ddressed b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moted by Fairclough and van Dijk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serves as an analytic tool that bridges text and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However , taking language and text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 CDA is hardly capable of viewing speech acts as the produc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in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context. Differing from CDA ,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oC) departs from communicative practice , which correspond-

ingly positions discourse in a “speech community” and cast it within the context where the practices take place. EoC aims to explicate how different speaking subjects mobilize a variety of discursive and communicative resources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mmunity and thus construct thei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inal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communicative practice. The researcher was discussing with several psychiatric nurs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erotomanic type of delusion disorder during dinner. This case illustrates that the meaning of a discourse is the consequence of speech interaction and practice among different speaking subjects within a context. Supplementary to CDA, EoC assists researchers to better comprehend how discourses are legitimized through everyday communicative practice, and also as communicative resources, how various discourses exert power on different “speaking subjects” and hence shape the meaning of the discourse in a context where multiple discourses are juxtaposed or even be at odd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ve practice; erotomanic type of delusion disorder

Network Entertainment Dubbing: Text “Guerrilla”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Alternative Voice

YANG Zhi-yuan

*Shanghai Film Academ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 Network entertainment dubbing video is a text type of new media network with transmission of high degree in recent year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ilm dubbing text, network entertainment dubbing text has not experienced cross-languag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wing a feature of fragmented misappropriation and highly intertextuality. In the expression, network entertainment dubbing text mainly takes advantage of the new dub to interfere effectively the image

subject, the system of original text meaning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to manufactur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text meaning, and then to produce a cultural field of antagonism. Network entertainment dubbing text has typical cultural features of modernism, embodies the spirit of carniv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kind of youth subculture expression, expressing the antagonism intention by its irony skill and style, which is a cultural strategy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It is largely played a function of review on a variety of hot social phenomena and issues, providing a way of opinion expression for the network public.

Key words: entertainment dubbing; alternative voice; carnival; irony; new media text

The Analysis of Netizens' Psychology and Risk Communication in Public Emergency

ZHU Y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age, online public opinion which caused by public emergency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As the netizen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online consensus' generating and proliferating,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imed at netizens' psychology become the key point to resolve the consensus' crisis. In public emergency, netizens have a complex psychological changing course in information choosing, accepting, processing and deliberating.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e must carry the appropriat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the netizens, switch political safety valve reasonably, attach importance to opinion leaders, and establish the big mediation system of online consensus.

Key words: public emergency; online public opinion; netizens' psychology; risk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丛 敏]